

日本汉学家

「近世」中国研究丛书



与江湖

——宋代诗学的空间

「日」内山精也 著

朱刚 张淘 刘静 益西拉姆 译
慈波 校译

復旦大學出版社

文之体有二：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台阁之文。所
处之地不同，则其为言不得不异，乌有一定之体乎？

——黄潜《贡侍郎文集序》

日本汉学家

『近世』中国研究丛书

朱刚 李贵 主编

庙堂与江湖

——宋代诗学的空间

「日」内山精也 著

朱刚 张淘 刘静 益西拉姆 译
慈波 校译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庙堂与江湖——宋代诗学的空间/[日]内山精也著;朱刚、张洵、刘静、益西拉姆译;慈波校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8

(日本汉学家“近世”中国研究丛书/朱刚,李贵主编)

ISBN 978-7-309-13108-6

I. 庙… II. ①内…②朱…③张…④刘…⑤益…⑥慈… III. 宋诗-诗歌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9629 号

庙堂与江湖——宋代诗学的空间

[日]内山精也 著 朱 刚 张 洵 刘 静 益西拉姆译 慈 波 校译
责任编辑/王汝娟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75 字数 216 千

201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3108-6/I·1057

定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I 宋代庙堂诗学

第一章 | 宋代士大夫的诗歌观 / 3

第二章 | 苏轼的杭州时代
——骚客与太守 / 36

第三章 | 苏东坡与黄山谷的万里交情
——围绕《黄州寒食帖》 / 63

II 诗人与江湖

第四章 | 长淮诗境
——从《诗经》至北宋末之演变 / 71

第五章 | 长淮诗境(南宋篇)
——爱国、忧国的意识形态 / 101

III 诗人自觉的演变

第六章 | 媒体变革前后的诗人与自编诗集
——初唐至北宋末 / 129

第七章 | 南宋中期的诗人与自编诗集的生前刊行
——宋代士大夫的诗人意识及其性质演变 / 155

第八章| 南宋后期的诗人、编者与书肆
——《江湖小集》编刊的意义 / 180

IV 何为诗之“近世”

第九章| 宋诗能否称为“近世”文学 / 215
第十章| 宋代刻书业的发展与宋诗的“近世化”现象 / 235
第十一章| 宋末元初的文学语言
——晚唐体的走向 / 280

初出一览 / 304

后记 / 306

第一章 宋代士大夫的诗教观

I

宋代庙堂诗学

第一章 宋代士大夫的诗歌观

一、导言

在北宋的中后期发生的如下文化现象,即使对悠久的历史来说也是令人瞩目的:身为中央的显官,同时又是第一流的学者,又是领袖文坛的作家,此种“官—学—文”三位一体型的知识人连续地出现。范仲淹(989—1052)、欧阳修(1007—1072)、司马光(1019—1086)、王安石(1021—1086)、苏轼(1037—1101)、苏辙(1039—1112)等就是其代表。他们大多是从第四代皇帝仁宗(1022—1063)的时候开始崭露头角或走上官途的士大夫。那么,为什么这一个时期里集中地产生了多位这样的士大夫呢?原因当然可以举出不少,但笔者认为,其最为根本、最具必然性的一点,乃是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录取名额的增多,令科举开始被认作官僚机构的最为重要的基础而发生作用^①。

以上六位,都是在虚岁19(苏辙)至28岁(欧阳修)之间,因进士及第而走上仕途的俊秀。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全都拥有幸福的青少年时代。比如说,范仲淹、欧阳修二人在幼年就失去了父亲(范2岁、欧4岁),因此不得不依靠亲族的庇护,在

① 有关科举方面的内容,主要参考了以下五种书:

- a. 荒木敏一《宋代科举制度研究》,同朋舍,1969年;
- b. 侯绍文《唐宋考试制度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
- c. 村上哲见《科举的故事》,讲谈社,1980年;
- d. 贾志扬(John Chaffee)《宋代科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
- e. 王炳照、徐勇主编《中国科举制度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

另外,拙稿《王安石〈明妃曲〉考(下)》(《橄榄》第5辑,1995年5月)中已论及相关内容,请一同参考。

简朴的生活中度过青少年时期。王安石也在应举的两年前(19岁)痛遭父丧,在进士及第的同时,不得不独自负担起一家的生计。剩下来无论是司马光还是苏轼、苏辙兄弟,都不是出自特别富裕的门第。要是在唐以前的贵族社会,他们恐怕无一不被视为寒门出身,连参与国政的机会都难以得到吧。然而事实上,他们升上了宰相(王安石、司马光)、执政(范仲淹、欧阳修、苏辙)、尚书(苏轼)等枢要的地位,不但左右朝政,而且在文化界担当了中心的角色。

他们之所以官运亨通,直接肇因于官僚社会整体的变化——门阀贵族或军阀之类被消灭,在绝对君主专制下,高度中央集权化的官僚机构得以确立,保证了科举出身者的升官之道。但不用说,这一切的前提在于科举,正是科举把走上官途的门户向他们这些寒门青年均等地开放,再加上“糊名法”和“誊录法”的制定,排除了血缘、地缘等种种情面因素的介入,确立了以实力为本位的考试制度。可以说,这才从制度上为他们这些社会的中间阶层提供了参与中央政治之可能。

宋代初期的科举,仍沿袭唐五代的旧制,在进士科之外还设有明经等诸科,但自第三代真宗皇帝的时候起,就呈现出重视进士科的显著倾向,到仁宗的时代,它便成为决定性的科目了。而且,从第六代神宗至第七代哲宗之间,进士科之外的诸科还被完全废止,从制度上也实现了向进士科一途的集中。

在太祖、太宗两朝,登上宰相、执政之位的官僚计40名,其中进士及第者30名,相当于75%。真宗、仁宗两朝,85名宰执中有74名进士,比例升至87%。接下来英宗、神宗、哲宗三朝,60名宰执中有56名进士,实际上超过了九成的比例。^① 对于

^① 参考周藤吉之、中嶋敏《中国历史5 五代·宋》(讲谈社,1974年)83页“进士科出身官僚一览”。

向进士科一途集中的如此情形，司马光曾有如下记述：

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①

正如司马光的话所确切传达的那样，在北宋中期以降的官界，进士及第（特别是甲科及第）被视为保证官运亨通的唯一捷径。从而，在这样向进士科一途集中的同时，官僚以及官僚预备队的知识基础或认识形态也应受到极大的影响，促进了这些方面的等质化、平均化。

也就是说，无论是作为青史留名的大牌政治家，还是作为具有独创性的学者，抑或以诗人、文章家驰名后世的人物，在他们起家之前的平均十余年间，应该都以“进士甲科及第”为共同目标，为此而同样地埋头举业。由此不难推知，至少在官途起步之时，他们具有极为相似的知识基础和价值认识。可以认为，进士科考试在保证他们官运亨通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知识基础的等质化，并将之引上极高的水平。由此我们可以相当精确地指出一种因果关系，即像上面六人那样三位一体型的官僚之所以大量出现，其最大的原因就在进士科的考试。

本章站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考察两宋三百年，特别是北宋中期以降，向进士科一途集中已成定局的时代里士大夫的诗歌观。^② 首先，在接下来的两节里，清理出有关“士大夫诗人”的

①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30《贡院乞逐路取人状》，《四部丛刊》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传家集》收在卷32，附题下注：“治平元年上。”治平元年是第五代英宗皇帝的第一年，即公历1064年。

② 已经发表的著述中，与本章关注点类似的，有村上哲见的论文《文人·士大夫·读书人》（初刊于中文研究会《未名》第7号，1988年12月。后收入村上哲见《中国文人论》，汲古书院，1994年）。村上氏将先秦至唐宋都纳入研究视野，围绕这三者的异同进行仔细的分析，特别是对“文人”与其他二者的界限作了明确揭示。本文在执笔之时，蒙其学恩甚多。

理想范型,然后在第四节至第七节里,取宋代文学史上的个别现象加以分析。另外,本章所用的“士大夫”一词,原则上跟“科举出身的官僚”几乎同义。

二、宋代士大夫的理想范型

如上所述,宋代的官僚进用制度,到第四代仁宗的时候,产生了向科举,特别是向进士科一途集中的事态。如果不是进士及第者,几乎没有官运亨通的希望:这种想法在士大夫社会里差不多已经普遍化了。因此,具备科举应试之资格和条件的家庭,其子弟应大都顺从此普遍观念,以进士及第为目标,埋头于举业的功课之中。

宋代进士科考试有三项基本内容:① 考问关于儒教经典的知识或理解的题目(“帖经”“墨义”“经义”)①;② 论文题目(“策论”);③ 文学创作题目(“诗赋”)。但是,这三项内容的重要性并不相等。

在神宗朝,经王安石的建议,“诗赋”被废止。从此以后,自北宋后期至末期新法政权的时代(神宗朝和哲宗、徽宗的亲政期),时间上将近半个世纪,共有十八次进士科考试②,是在不包括“诗赋”考题的情况下进行的。南渡之后,以元祐年间的政策为准,而于建炎二年(1128)恢复了“诗赋”考试,但进士科本身也依照元祐年间的做法,分成了两种模式:考“诗赋”的一种,与考题中不含“诗赋”的“经义”一种。此后直到宋末,两者都无法

① “帖经”的考法,是把经书的某几个字隐藏起来,让考生填空;“墨义”也与此相似;“经义”则是按经书的含义写作议论文。与偏重背诵的前二者相比,后者在考查理解能力这一点上有更高的要求。经过王安石的科举改革,进士科新设了“经义”考试,而“帖经”“墨义”被废止。请参考村上哲见《科举的故事》第3章第2节。

② 参考荒木敏一《宋代科举制度研究》附录“宋代科举登第者数以及状元名表”。

合并。而且,不光是王安石,在他之前,范仲淹、欧阳修等也曾于仁宗庆历年间提出改革方案,其主旨是以“策论”为最重要的考试内容,而把“诗赋”放在末尾。这样,到北宋中期后,“诗赋”的重要性比唐代至北宋初期显著下降。不过,即便是这“诗赋”,除了新法政权下的半个世纪外,毕竟还是包含在考题之中,故从有宋一代科举史的全体来看,它无疑也是区分合格与否的重要依据之一。

从而可以说,上述的①—③三种考题,反映了支撑宋代士大夫知识基础的三大要素。如果画成图式,便如图1所示。此图以进士科的考题为根据,表示宋代士大夫在官僚身份之外,必定兼具学者与诗人的身份。至于三者之间的优先级,严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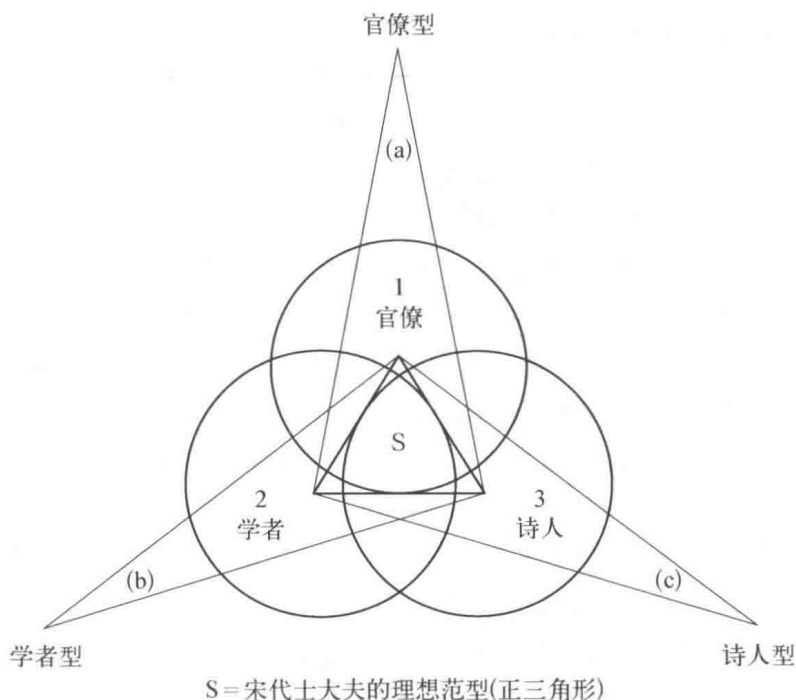


图1 宋代士大夫的理想范型

来说应随个人的情况而有不同，难保其一定不变，但至少在应举的前后，大致的标准当是：官僚立场第一，学者第二，诗人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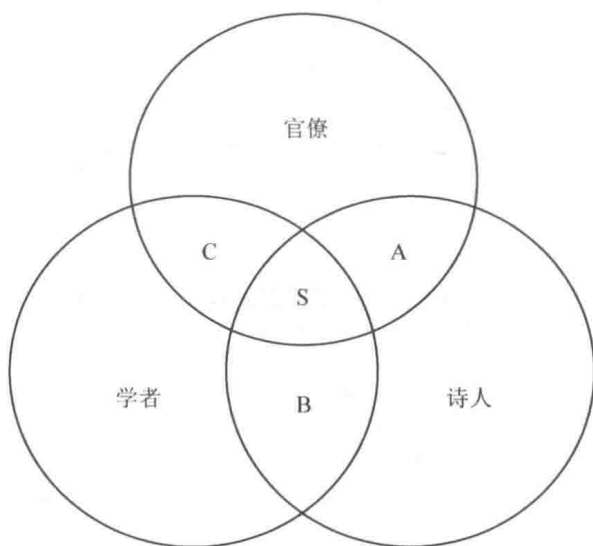
首先，考虑到应举这一行为本身就出于谋求官职的目的，故应当认为，在他们的意识中，官僚立场总是保持着相对于其他二者的优先性。其次，关于学者与诗人孰先的问题，在王安石的科举改革中有颇具象征性的表现。从他最重“经义”而废弃“诗赋”的做法可以推知，在北宋中期以降的官界，其时代性的趋势是重视学者立场尤过于诗人立场。与此相关，在文体层面上，从他们的价值意识来说，“策论”或“经义”之类所采用的文体，即散文的技巧，应该比韵文受到更高的重视。宋代的古文六大家都集中出现于北宋中、后期的事实，就与这种时代性的趋势有着某种联系。

为明确起见，将进士科考试的三种考题与官僚、学者、诗人之间的关系表示如下：①“帖经”“墨义”“经义”是考查作为学者的能力；②“策论”主要考查作为学者及官僚的能力；③“诗赋”考查文学创作，即作为诗人的能力。

这样，即便三者之间存在着优先级，对当时的士大夫来说，“官—学—文”三种要素，应该是缺一不可的。所以，他们的理想范型应该如图1所示的三角形S，这种构造反映了他们的理想。假如他们在后世是以作为官僚的功绩得到突出的评价，这个三角形就成了向官僚的一角伸长其锐角的形状，假如是作为学者或诗人的评价更为突出，那也将呈现同样的形状。不过即便在那样的场合，与其他两种要素合在一起构成的三角形，仍是宋代士大夫的基本构造。因此，这个三角形的更被期望的形状，是尽可能地接近于正三角形，而且可以想象，这正三角形的面积越大，就越能得到他人的敬仰。

三、宋代士大夫与社会、政治批判诗

图2表示了三者交叉的领域,即官僚与诗人(A)、诗人与学者(B)、官僚与学者(C)各自互相交叉的领域。更具体地说,A可以列举出社会、政治批判诗,或与各种朝廷仪礼相关的诗等;B可以列举出被评为“以学为诗”一类多用典故的诗,或咏史诗等;C可以列举出经学或史学等。



A: 社会、政治批判诗, 与各种朝廷仪礼相关的诗等

B: “以学为诗”“以理为诗”类的诗, 咏史诗等

C: 经学、史学等

图2 三者的交叉领域

图3表示了诗歌题材上“公”与“私”的区别。其中,“公”的领域中例示的题材与图2的A相当。这些题材,不同程度地被作者作为官僚的一面规定了它的内容。爱国主义的题材在南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时国土只剩下南方的这一半,所以收复失地成为至高无上的命题。而在北宋时,虽也一直存在着

跟辽和西夏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此种题材还没有担负像南宋时那样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公”的题材之中,为两宋士大夫所共同而普遍地创作,且最具象征意义的,是社会、政治批判诗。



图3 诗歌领域的“公”与“私”

当诗人把自己看作一个士大夫,即站在民众之上领导社会与文化的存在时,作为联系社会与自己的纽带,或者还作为保障此纽带的文化手段,社会、政治批判的题材就理应具有其他题材无法比拟的重要意义。这是他们为了表现作为公共人物的大丈夫气概,而不可缺少的题材之一。实际上,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传至今日的士大夫诗人,几乎都留下了这一类的诗歌。今日的我们接触到这类诗歌时,由于它们往往带有类型化的表达方式,所以经常不怎么感觉得到它们的文学价值或独创性。然而根据上述的理由,应该认为,对当时的士大夫来说,这个题

材所具有的意义,其重大的程度远远超越了习惯于狭义的文学范畴的今日我辈的价值意识。

创作这种题材的诗歌,其理论上的依据主要是《毛诗大序》所说的“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一节。对诗歌的讽谏作用或社会效能加以积极肯定的这一节,随着《毛诗正义》被指定为国子监以及州县学的标准课本,而成为唐宋士大夫间最为普遍的诗歌观之一。这样的诗歌观可以同时被理解为,作为士大夫的他们必须担负起把朝廷与民间联结起来的媒介作用。

这样,对宋代士大夫而言,社会、政治批判诗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实际创作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概观他们的实际创作状况,就能注意到两种主要的、显著的倾向:第一,在整个生涯中一直都在大量创作此类题材诗歌的诗人几乎不存在;第二,其大量创作的年代大致都偏在青壮年时期。度过比较长寿的一生,又有较多诗作传至今日的宋代诗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显示了这样的倾向,例如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张耒、范成大、杨万里等,即是如此。用图式来表示这样的倾向,就如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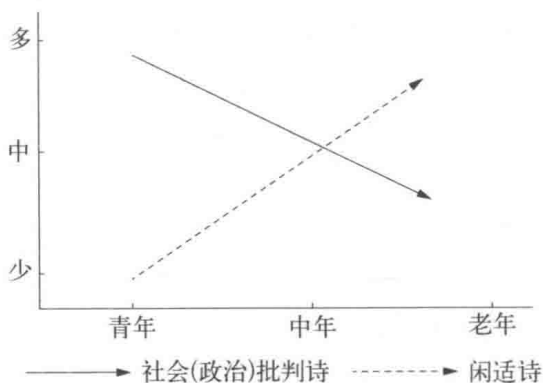


图 4

造成如此倾向的原因，可以合理地说明如下。

在科举应试过程中彻底地学习了儒教“兼济”理念的士子，一旦科举及第，通常先被指派为地方官的属员。心中燃烧着社会理想的少壮士大夫，在那里开始见闻到与理想有差异的种种充满于现实社会的矛盾。然而，刚刚走上仕途的他们能够行使的权力是极为有限的，对中央的发言权、影响力也肯定不大。因此，对他们来说，作诗是公义上被允许的唯一手段，却也是传统上被视为极具政治效能的手段。他们只能诉诸作诗这一手段，来揭示社会矛盾，努力唤起中央的更大关注（这是他们多作批判诗的主因①）。同时，只要这样的诗作被社会所肯定，那么多作这样的诗歌便意味着自身存在的魅力，此种实利的效用也不应该被忽略（这是他们多作批判诗的主因②）。

然而，这些少壮士大夫，几经官职迁转，渐渐就变成官界的中坚、官场的高手，其在政界的发言权也不断增大。曾经站在批判立场的他们随着地位的升高，不久便倒过来成为批判的对象了。而且，已经成为官界中坚的他们，在外任地方官的时候，大致都是作为州县的长官而赴任的。如果在赴任之地发生了社会问题，已经掌握了该地域之最高权力的他们所应该采取的行为，当然不再是多作批判诗而已了。行使给予的权力以适当地处理、解决问题，应是最为优先的职责。否则就不能尽职，会被烙上长官失责的印记。如此，作为官僚的职责上的变化，可以算作促成批判诗减少的主因之一（这是引起他们作风变化的要因①——保身）。

而且，在积累官界履历的过程中，他们不管自愿与否，都要学习现实社会的运作方式，不再只依理念、理想，以个人的气力来行事（这是引起作风变化的要因②——看破）。在此基础上，再加上公平地降临于所有人身上的从肉体到精神的衰老，使作为诗人的他们更多地转而关心个人的生死问题，以及与个人嗜